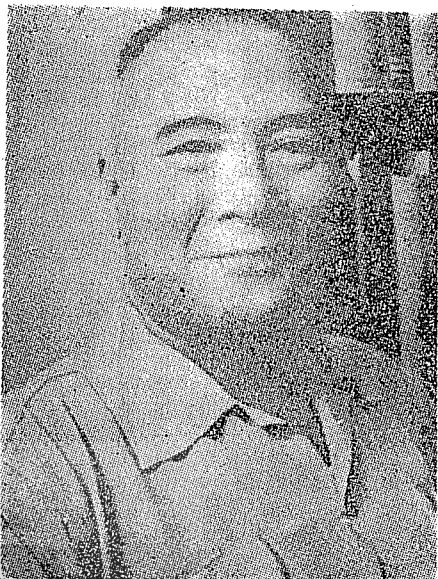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圖為張國燾晚年的照相

細說張國燾（五）

· 費雲文 ·

憤恨毛澤東背信另立「中共中央」

張國燾在毛兒蓋會議中他主張，擱置毛澤東的預擬文件，自由交換意見；另行召開高級幹部會議，吸收新人參加工作；實施黨內民主。

毛澤東拒絕了張國燾的建議，毛認為現在是軍事行動時期，不能談黨內民主，一切以中央命令行事。

結果，會議既未表決毛澤東所提出的預擬文件，也未討論軍事問題，又是不了了之。

可是當他們正為「蘇維埃運動」是否正確激烈爭論時，史達林却已放棄這個「蘇維埃」法寶，改弦更張的使用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的新武器。他透過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七次

大會，加以宣佈，制成本案；並且由「中共中央」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，以「中共中央」的名義，發表「八一宣言」，主張組織「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」。

毛兒蓋一帶，是半耕半牧的藏民集居之所，人口稀少，糧食不足；非可久留之地；加以毛、張等會合後，已有相當時日，國軍正部署新的圍剿行動。於是，張國燾提議「擱置黨內歧見，力求軍事出路」的辦法：

「全部紅軍迅速進入甘肅南部岷縣、臨潭一帶，再依情況決定北進或西進。」

總司令部率領現駐毛兒蓋以西的原四方面軍的第九、卅一兩軍，經刷金寺北進，為全軍左翼。

徐向前、陳昌浩率原四方面軍的大部份

，為全軍右翼，為中路打開北上通路。
林彪、彭德懷所部為中路，掩護中央機關。

董振堂、羅炳輝部為殿後。」

此一計劃，把戰鬥的重心放在「四方面軍」上，「一方面軍」的任務比較輕鬆，自然為毛澤東等人所贊同。

民國廿四（一九三五）年七月，張國燾、朱德、劉伯承等按照計劃率領左翼軍由刷金寺前進，但被大雨水所阻，一連三天，河水陡漲益深，祇好再回刷金寺，中途，即以總司令部名義電令各軍暫停行動。

當左翼共軍阻水的第一天，右翼軍却能攻佔松潘以北一個據點，為中路軍打開一條北上的通道。

毛澤東却願坐失良機，竟不理會「總司令部」電令，自己下令林彪、彭德懷等「第一方面軍」的一、三兩軍團，以「北上先遣隊」名義，秘密單獨前進；事先並未通知右翼軍。他所以用「北上先遣隊」的名義，是想讓國軍誤以爲他所挾帶的中共中央機關和要員，祇是一個支隊；真正的中共重心仍在毛兒蓋。是一種轉移目標的陰謀詭計。他順利到達甘南岷縣南部地區後，却電盼「總司令」各部跟進。

張國燾與「總司令部」同人研究，認爲毛的單獨行動已經打草驚蛇；國軍已有足夠時間派軍扼守甘南戰略要地，於是，他決定「暫時南進計劃」：

「乘敵不備，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、廬山一帶，補充冬季服裝。如遇不利情況，可以縮回西康、藏族地區過多。吸引國軍注意力，減輕『北上先遣隊』所受壓力；製造明年春夏之交再行北上的機會」。

隨即率軍經阿壩南下，順利到達卓克基。舉行高級幹部會議，右翼軍也來參加，共出席三千餘人。大家對毛澤東突然單獨秘密北上，以爲是不顧信義，破壞黨和「紅軍」的團結。甚至有人指責他既然是「中共中央」的領導者，不應有此破壞黨紀與軍紀的行動。於是，在羣情激忿之下，通過了兩項決議：

1. 不再承認「中共中央」，另行成立「臨時中央」，推選張國燾爲「臨時中央」書記。電告毛澤東，此後雖不再接受「中央」命令，但軍事行動仍互相配合。

2. 由「總司令部」根據「臨時中央」的決定，指揮全軍。徐向前、陳昌浩率原「四方面軍」向天全、廬山地區活動，董振堂、羅炳輝率部鞏固懋功與卓克基後方；希望能建立「川康蘇區」。

會議以後，名義上中共分裂成兩個「中央」了，實際上，張國燾並沒有進一步強化「臨時中央」的組織和作用，也沒有選出新的「中央委員」，也沒有對原有的「中央委員」加以制裁，當時，所着重的還是軍事行動，而以「打到天全、廬山吃大米」爲號召；以「廢除苛捐雜稅」、「減租減息」、「平分土地」、「停止內戰，一致抗日」、「與川軍劃分防區，互不侵犯」爲「南下綱領」。

當他們順利攻佔寶興，接近天全、廬山之際，却遭受國軍空軍的迎頭痛擊，一次空襲中，即被炸斃三百人之多；加以國軍薛岳、周渾元兩個有力縱隊的追剿；祇好結束「南下計劃」，而於當年九月退回懋功及大金川一帶的集鎮。繼而壓迫駐防巴丹的劉文輝部退往湫定，而在靖化、黨壩地區停留下來，苟延殘喘。

由於糧食不足，不得不于十月底，冒險翻越大雪山，到達比較充足的道孚、爐霍、甘孜地區。此一地區喇嘛勢力特別大，採取教合一制。張國燾的那一套「綱領」不能提出，祇好儘量以和藹態度取得當地人民的諒解合作；解決糧食供應問題。

甘孜的「活佛」，曾對張國燾說出他對「紅軍」的觀感：

「如果紅軍處境好些，不會比劉文輝壞；可是它現在窮困，搜括超過劉文輝」。

自民國廿四（一九三五）年十一月到廿五（一九三六）年六月，他們在西康與劉文輝部隔折多山對峙，相安無事，乃得集中力量，從事訓練、補充衣物等工作；爲奪取河西走廊和新疆預作準備。

西進之師覆沒 去陝北與

毛會合

毛澤東自毛兒蓋率部北上，原有一萬多人，沿途遭受國軍截擊，損失慘重，祇剩四千餘人；于民國廿四（一九三五）年十月廿日在陝北瓦密堡附近，與原在陝北的劉子丹、徐海東（原在豫鄂皖留守，因國軍清剿，才逃抵陝北，與劉合流）會合。次年二月，爲了解決陝北的糧荒，大舉渡河侵入山西，却在同蒲路被國軍擊敗，劉子丹就殲，死傷極重，殘部退回陝北。從此不敢再作軍事冒險，而積極從事「統戰」活動。

共產國際爲了傳達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的新策略，調處中共的分裂，特派林育英回中國。當他抵達陝北後，立即電告張國燾種種情形，明白揭示今後中共的口號應當改爲「聯蔣抗日」。張國燾百感交集，他以他最初原主張實行「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」，因爲共產國際的指示，才改採加入國民黨的「右轉」政策，碰了釘子；又急劇的改走極「左轉」的「蘇維埃」道路，又碰得頭破血流，如今又回到當初的起步點，再搞

「聯蔣」；真是一大諷刺，同時也是中共的悲哀。經過一番討論，終於覆電林育英，熱烈擁護此一新政策。

林育英鑒於陝北、西康雙方意見已趨一致，乃覆電提議黨的統一，雙方不再以中央名義命令對方，由他暫時担任雙方聯絡人。陝北方面，由張聞天具名通電同意林育英的辦法，張國燾也覆電贊成。兩個「中共中央」之事，遂告結束。

陝北搞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」軍事方面的對象是楊虎城和張學良，楊虎城早有勾結，張學良處則利用俘獲的張部團長萬毅，說服他回去向張學良「苦諫」，要求「停止剿共，一致抗日」。

接着，中共即派人去西安與張學良接洽，籌建西北抗日局面；並且要求在川康的張國燾部，也開到西北來，原來的「聯蔣抗日」，變成「聯張反蔣抗日」。

民國廿五（一九三六）年六月，賀龍的「第二方面軍」和蕭克的「第六方面軍」也到達西康，與張國燾部會合。此兩部隊的實力，原有兩萬人，現在祇剩五千人；而且已經合而為一，仍用「第二方面軍」的番號，以賀龍、蕭克為正、副總指揮，任弼時、閻向應為正副政治委員。

當任弼時充份瞭解中共在毛兒蓋分裂的經過，他認為雙方都有成見，但凱豐那篇指責「四方面軍」和張國燾的文章，大不應該；毛澤東秘密率部北上，是不適當的，但「四方面軍」的反對呼聲，也加強了他的疑忌；卓克基會議決定成立「臨時中央」，太過份了。最後，他要求雙方拋棄前嫌，和好合作。

由於上述種種因素，加以前此林育英來電，曾表明史達林很贊許張國燾的「西進計劃」，他認為，如果中國紅軍能控制新疆和甘肅的河西走廊一帶，蘇俄將予必需的軍需供應，協助訓練工作。因此，當疲勞的「第二方面軍」休息一個月後，張國燾乃決定全師北進。由劉伯承、任弼時、賀龍率「第二方面軍」和羅炳輝部為右路，出甘肅的岷縣、靜寧進至海原一帶的甘北地區；「總司令部」則率原「四方面軍」和董振堂部為左路，經岷縣，取道隴西，通渭，折而向西，奪取甘肅的河西走廊。

右路軍出發後，起初頗為順利，但到了天水，却被胡宗南部痛擊，損失很大，祇好向靜寧以北地區急退。

左路軍人多勢盛，攻佔會寧、靖遠縣城準備由靖遠附近西渡黃河。陝北的彭德懷也率部前進攻到同心、海原一帶；徐海東也率部前進到打拉池地區；策應他們。

靖遠雖然是渡河的好地方，可是缺乏渡河工具。為了製造渡河工具，需要相當時間。而國軍已乘此時機，加強堵截的調度。一面以空軍監視渡口，一面調胡宗南、朱紹良、關麟徵、毛炳文等部自平涼、天水向西追剿。

左路軍有三萬五千人，為了慎防空軍轟炸，祇能乘夜晚偷渡，花了三個星期時間，祇渡過一萬多人。其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等共兩萬多人，不但無法再渡，而且還在會寧、靖遠的大道上，被追剿的國軍，打得焦頭爛額，祇好向東北逃竄，靠近徐海東部，再由打拉池、海原、同心向

東移轉，靠近「陝北蘇區」。

渡河西進的一萬多人，歸徐向前、陳昌浩指揮，由景泰沿長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門子，直趨武威。可是，當他們進展到古浪時，却被馬步芳的騎兵澈底擊潰，窮追猛打，損失慘重。而胡宗南部也已駐守武威，嚴陣以待，阻礙了他們滲透西進之路。於是向正在河連灣的張國燾緊急求援。

張國燾與朱德，以及毛澤東派來和他接洽的周恩來會商，由於渡河的限制，國軍的監視；使他們無法也無力應援。結果，董振堂陣亡，少數幾百人，逃往新疆；也有零零星星的偷逃回陝北歸隊的。

事勢既已如此，張國燾和朱德，周恩來會商局勢，張提議他和朱德率紅軍學校學生前往「中共中央」駐地保安，與毛澤東等會商今後工作。前線部隊（包括四方面軍的第四軍、卅一軍、二方面軍等）暫交彭德懷指揮。周恩來則先赴各縣，料理未了之事，然後再返保安。

從此，「紅軍」又開始合而為一了，張國燾也失去了軍權。

失去權力優勢 飽受殘酷

鬥爭

西安事變時，「中共中央」應張學良的要求，將「紅軍」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線，由彭德懷以前線總指揮名義負責指揮，與張學良、楊虎城部隊銜接。事變結束後，「中共中央」即遷往延安，成為「赤都」。

毛澤東乘遷居的時機，逐漸把「總司令部」所屬的機構，「參謀總部」和「總政治部」等人員，併入他直接指揮的「軍委會」，控制了通訊機構，包攬了中央軍權，一切由他發電直接指揮，總司令朱德和張政委會國燾徒負虛名。到達延安後，他又控制了外交權。

民國廿六年（一九三七）年二月，他派周恩來往南京商談輸誠之事有了眉目；於是，他將注意力轉移向黨內鬥爭，而其首一目標，就是比他資格老，常常有相反意見的張國燾。

事先，製造輿論，將「西進計劃」失敗的責任，都推到張的身上，說他是「逃跑主義」，說他領導「四方面軍」一無是處。

接着把持論公允，調解黨內紛爭的林育英調走。

接着，選定「抗日軍政大學」為鬥爭張國燾的場所，毛澤東幕後策劃，張聞天、凱豐負責指導，事先秘密部署，臨時再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發動起來。校長林彪以及其他要人，採取隔岸觀火態度。

有些原「四方面軍」的高級幹部很不服氣，向張國燾訴說不平。張國燾還想引咎自責，息事寧人。他以為「黨內鬥爭並不是以真理為依據，而是隨鬥爭形勢和力量對比而轉移。現在形勢對毛有利，所以希望一般同志，專心學習，檢討過去工作的錯誤，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」。

可是，你退一步，他進一尺。鬥爭的魔手，並未因張國燾的退讓自責而罷休；反而武斷羅織的確定張國燾的罪狀為：「右傾機會主義」、「

四方面軍的領導破產」、「反黨反中央」；而其所以有這些罪狀，是張根本上有「土匪主義」、「軍閥主義」。

接着，又要求「四方面軍」幹部回到「中共中央」領導之下，檢討過去錯誤，再不受張國燾的影響。可是，許多「四方面軍」幹部，却要求全面檢討，也檢討毛澤東所領導的「中共中央」，是否也有錯誤。

此一反要求，觸怒毛澤東，由「抗大」的副校長羅瑞卿和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出面，以極具侮辱性的審訊方式，個別的鬥爭「四方面軍」幹部。

如此高壓蠻幹，終於引起「抗大」內部大多數學生的鼓噪。許世友、王建安等十數個「四方面軍」高級幹部，領導四五百學生，企圖立刻離開「抗大」。

為了平息風潮，由朱德、林彪出面請張國燾去「抗大」發表演說，想藉以寬和一下激怒的羣衆情緒。張如約前往，當表示：

「所有『抗大』學生，中共黨員，都不可有違反紀律的行動；但是黨內的鬥爭，也應該在正軌上進行。每個同志，不管來自那一軍，都應檢討過去有過的錯誤，也有權利義正詞嚴的拒絕那些不應有的指責。如果問題不能在『抗大』解決，也不可違反紀律。每個同志都有權將問題向上級黨部和中共中央提出，甚至向共產國際控訴」。

他的演說，雖然平息了「抗大」的風潮，但即使毛澤東非常不滿，認為他仍在反抗，因而採取更高壓的手段。不但不遵守諾言，釋放被捕的許世友等高級幹部，反而再捕四十多人，連原任「四方面軍」第九軍軍長，現任「抗大」副校長的何長也被捕了，並且一齊交歸「最高法院院長」董必武審理。

接着，二月廿日，周恩來在距離延安卅里的地方，被人襲擊，受了一場虛驚。當地正是原屬「四方面軍」的駐守範圍；於是，毛澤東又推測係出自張國燾的主使。當天晚上，不但延安宣佈戒嚴，如臨大敵，而且也派兵監視張的住所，斷絕內外。

可是，第二天真相即已大白，駐守該地區的「四方面軍」部隊，已將襲擊周恩來的土匪活捉幾人，供認係攔路搶劫，並未受人主使。

一再遭受疑忌侮辱，張國燾痛心已極，乃搬出延安城，在北面山上找個密洞，修心養性，表示不再過問黨內之事了。

毛澤東抽人的鞭子，並未就此鬆手，當「抗大」反抗的情緒穩定以後，他又與張聞天等出面，以「中共中央擴大會議」名義，召開「反張國燾的鬥爭會議」，把張國燾也找去參加。當時，主要的「中央政治局委員」周恩來、秦邦憲等多未參加，出席多人，大都為「抗大」學生。

會議由凱豐為鬥爭主將，他指出：

「四方面軍對共和蘇維埃運動，確有過極大貢獻，但這不能減輕張國燾的罪過；因為張國燾是一貫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。」

接着，他說到「西進計劃」的失敗，竟大噪

門吼叫：「要張國燾抵董振堂的命！」

身為「中共中央」書記的張聞天，也搶先發言，指責張國燾的「軍閥主義」、「土匪主義」、「分裂中共」，已發展成為「反黨的張國燾主義」，這已不是錯誤，而是罪惡；應當受黨紀制裁。

毛澤東居然以輕鬆陰沉的態度，以調人自居的表示：

「國燾同志一向有反中央的傾向，曾是『小組織的老祖宗』；現在既然形勢對國燾同志不利，我看，還是認個錯吧！」

張國燾不得不起來答辯，首先承認成立「臨時中央」的錯誤，但他聲明這是在「蘇維埃」路線走到絕路，應改變政策而未改變時，黨內所發生的歧見；現在早已不存在了。同時，他強調「紅四方面軍」的英勇奮鬥決不可抹殺，而應當承認是中共屬下一支有教養的、有紀律的「工農紅軍」勁旅。

當時有人對他的答辯不滿意，主張拖出去公審；張國燾也不甘示弱的表示有盡情答辯和反擊的權利。

第二天，「中共中央政治局」弄個決議案，批判張國燾的「反黨路線」，但沒有處罰。仍保留他「中央委員」和「中央政治局委員」的職位。

他經過此次鬥爭，意識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缺陷實在太大，這一極端反動的專制獨裁，會毀滅一切理想。他隱居在郊外，閉門謝客，不安電話，不出席任何會議，也不告假，以示無言抗

議。

可是，四月中旬，毛澤東却親自率領中央政治局「的委員們，移樽就教的由延安來到他的住所，商討投誠國民政府的條件。這又使他已經冷淡下來的心情，熱烘烘起來。本着他一貫熱愛中共

的初衷，考慮雖然不再參加政治局會議，但也應參加一些實際工作。
於是，他接受「抗大」教務長成仿吾的邀請，去「抗大高級班」講授他自己認為造詣很淺薄的「馬克思經濟學」。(未完待續)

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七

彩虹夢

吳崇蘭 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。心高命薄夢成幻。愛情井。老母豬與貂蟬。老朋友、情書。我和他。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定價台幣一百二十元優待「時代文摘」及「中外雜誌」讀者祇收90元。

中外雜誌稿約

一、本誌園地公開，舉凡人物傳記，趣事軼聞，真實傳奇，旅遊記趣，生活體驗，科學新知等稿件，均所歡迎。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者尤佳。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壹萬字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不在此限）。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稿酬從優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刊。經採用之稿件，其著作權即歸本誌所有，本誌交由「時代文摘雜誌」轉載或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六、本誌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同意，不許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八、作者來稿務請影印一份自己留存，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，如必須退稿，務請附寄掛號費郵資以免平寄遺失，來稿請寄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